

唐代民间借贷利息的官方与民间两视野

——对一份敦煌吐鲁番契约的解读

周 静 张 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6-7833(2008)02-138-02

摘 要 敦煌吐鲁番契约原件大都是书写于民间的,并且广泛应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因此对于这批材料的研究,可以逼近历史社会的“原生态”,可以窥见古人经济逻辑思维的遗迹,可以弥补中国法制史传统研究以封建国家大典为对象而忽视社会实际运作情况的缺陷。本文仅以其中一份契约为例进行分析,意图了解唐代借贷利息的法律调控与社会操作的差异所在,并尝试性的寻找其中原因。

关键词 借贷利息 民间借贷 国家恩赦

借贷契约是借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一般不牵涉到第三人,因此,借贷契约的成立和履行,国家原则上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国家为维护自身统治,主要关注借贷关系的核心问题即利率及利息总量。但这种调控也并非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以《唐乾封元年(六六六年)高昌郑海石举钱契》^①为例就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法律调控的遵从情况:

第一行 乾封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崇化乡 郑海石于左憧

第二行: 边举取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

第三行 文半。到左须钱之日,噉(索)即须还。若郑延

第四行 引不还左钱,任左牵掣郑家资杂物、

第五行 口分田园,用充钱子本直取。所掣之物,

第六行 壹不生庸。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

第七行 若郑身东西不在,一仰妻儿及收后保

第八行 人替偿。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和立契,

第九行 画指为信。

第十行 钱主左

第十一行 举钱郑海石(画指)

第十二行 保人宁大乡张海还(画指)

第十三行 保人崇化乡张欢相(画指)

第十四行 知见人张欢德。(画指)

一、法定利息与民间利息

唐《杂令》“公私以财物出举”条: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公廨,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又不得回利为本(其

放财物为粟麦者,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②。

首先,唐令规定月利不得超过六分,即6%,而此契月利却是15%,达到法定利率的两倍半。其次,唐令还规定“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是说履行时间即使长,利息也不得超过本金。按此借契的月利计算,7个月即子本相侔,利息超过本钱一倍,而契约中约定的“到左(左憧)须钱之日,噉(索)即须还”,却是一个弹性时间,没有确定的还期。因而,如果在7个月之内偿还,自然只是一重违法,即违背了月利不得过6分的规定;若超过7个月再索要,就意味着不仅违背月利率规定,也违背了“利息不得过本一倍”的限定,是双重违法。总之这张契约属于“违法积利”“官为理”的行为。

《杂令》“出举取利过正条”条规定:“诸出举,两情和同,私契取利过正条者,任人纠告,本及利物并入纠人。”^③这个鼓励告讦、重点惩罚贷出方(同时也惩罚了贷入方)的救济手段,也是出于保证利率、利息总量不超过最高限制的意图。即使当事人情愿,是事先约定,利率仍不得高于限制,也不得“过一倍”以及“回利为本”。《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还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疏议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④准此,则牵掣债务人财物应须告官听断,不告而牵掣即是“强”,强牵财物超过契约标的物数额者,依其超过数额论罪,不超过者,不以“坐赃”论罪,但似应以“不应得为”罪处罚,官员犯此,则加重处罚。唐开成二年(837年)八月二日敕文云:“不得五分以上生利。如未辩计会,其利止于一倍,不得虚立倍契,及计会未足,抑令翻契,回利为本。如有违越,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请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日。如属诸军、诸使,亦准百姓例科处。”^⑤倘若严格依据法律规范,本契的贷出方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承担极大的契约风险,只要贷入方甚至是任何知情人告,贷出方不仅会丧失本钱及利息,还将面临严峻的刑事处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学界普遍认为“吐鲁番新出的借贷契约有20余件,多是民间的小额借贷,当年借,当年还,月息为10%到20%。”^⑥如此看来,民间借贷高出法定利率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本契并不是一个例外的违法行为。我们还看到,本契还款日期的规定是:“到左须钱之日,噉(索)即须还”,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时限,也就是说,出贷人可以通过自身利益随时决定还贷期限的时日。因此可以说,在唐西州时期的借贷契约行为中,出贷人实际上是处于主动地位的。此外,从唐代朝廷留下的文献

看,民间借贷超过“倍息之利”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大和十一年九月,据东都御史台奏称,从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十一年,东都洛阳借官高利贷利息超过本金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有的举债人自己和子孙死没后,放贷人向亲族旁支及保人追索,导致保人纷纷“逃死”,致无人可追。如果法律规定的救济均能实现的话,保人何以纷纷“逃死”呢。可见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与实践操作存在很大差异。

二、国家恩赦与民间人从私契

本契中有“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字样。这说明当时国家必有恩赦私债的事情发生。

事实上,国家公权力对民间私人债务的赦免,源于国家对于私人欠负国家债务赦免的惯性,是国家官债务赦免的延伸。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均延续了这个传统。^⑥唐代赦免公私债负,应始于唐高祖时,《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务农》载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六月乙未诏:“其公私债负及追徵输送,所至处,且勿施行。”这里的“且勿施行”还不能等同于放免。只是暂时不施行。不过,其后官债、私债一同放免的传统,却一直保持了下来。对国家放免行为的解释可引唐宪宗敕文云:“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这都是意欲解除受困于高利盘剥下的穷苦百姓,缓解社会矛盾,加强国家对编民控制的办法。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侵吞,所在逃散”,国家纳税户口已“什不存一”。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来源。也说明土地兼并问题的激化与私人高利贷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从频繁发布的诏书及专门的赦令对民间债负的赦免,我们可以体会到国家的用心,可以看到这一态度的坚决性。但是,事情本来就是复杂的。国家既不愿意看到社会被高利贷者所搅乱,也要保证最基本的交易秩序,所以,在作为基本制度的法律上,我们又能注意到国家维持基本债权债务关系稳定性的立场。

契约原件中出现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条款反映了民间对此类恩赦诏令的抵抗以及防御意识的加强。“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条款意为“国家公共管理方面由法律来规范,人与人之间按照私契的约定来行事”^⑦。对这一条款作如此理解的原因是这类条款大多是紧跟在抵赦条款之后,表明当事人不希望国家过多地干预私人生活。从当事人的诉讼语言与契约原件语言看,当事人对国家的态度是又爱又怕,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种不能平衡的张力。一方面,当事人想从官方那里多要一点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相应的手段来摆脱官方对自己的控制。其所用语言“不免”和“不停征”是说借贷关系不论有息(借银钱、贷粮种场合)、无息(借粮种场合),有息者要本、息俱还,无息者必须还本。国家不能赦免私债,不能免除债务人义务。余如掣夺家资、保人代偿等约定条款,也应被理解为继续有效。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⑧

三、官方调控与民间操作差异形成之原因

首先,从贷入主体方考察。中国古代经济在生产方面是以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自给性生产为主。民间借贷也主要运用于生活消费,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缺乏及缴纳赋税、服差役、丧葬嫁娶病等用途。借贷主体绝大部分是小生产者,即小自耕民、佃民、私人手工业者等。马克思说过:“小生产者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件,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个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⑨小农经济过份脆弱,使他们常处于破产的威胁之下。当借贷成为唯一的选择,利率的多少自然也由不得自己做过多的要求。唐人所谓:“幸逢有年,才偿逋债,敛获始毕,糗粮已空,执契提囊,行复假贷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整个民间借贷总是处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当然谈不上利率的稳定及回落而只能是利率的高涨及再生产萎缩,生产者被束缚在高利贷的罗网之中。

其次,从贷出主体方考察。唐朝封建官僚特权阶级是投放私人高利贷的重要力量。史载太平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件于御府”,被籍灭时“息钱收之数年不尽”。安史之乱结束后,一些节度使贷欲“动逾亿万”,用于放贷的“方镇钱”则“少者不下五十万”。这些特权阶级本身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则兼官僚与高利贷者于一身,并依托官府“列锤挺胁”来追债。大历时,广陵(今南京)“地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诸道观察纷纷将“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⑩,直接挪用军资进行高利放贷。这种情况下,何人还会顾虑到法律的规定。此外,唐代民间高利贷投放的主要力量还是商贾阶层。前文《唐乾封元年(六六六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中的出货方左憧念生前给张利富、张海欢、郑海石、张善态、龙惠奴、赵丑胡等多人放过高利贷,也是一个典型的职业高利贷商人^⑪。这部分主体要么与特权阶级联合,权钱勾结使得法律成为虚设,要么就因为国家调控加强增强而要求借出的钱加更多的风险溢价来作为契约风险的补偿。结果,可能形成国家调控越是强烈而民间借贷成本就越高的情况。

在贷入方与贷出方形成这种“愿打愿挨”的合意后,高利贷就成为了国家法律无法控制疆域。一方面是商贾、地主、官僚财富的积累和如火如荼的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接踵相继的破产逃亡,这就必然使得封建的“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封建经济也就在这种状态下被腐蚀分解,走向衰微。

注释:

① 燕海雄:敦煌吐鲁番汉文借贷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地位研究,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5.25(6)。

② 龚仪:宋刑统(卷二六),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③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④ 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北:三民书局,1966。

⑤ 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⑥ 霍存福: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3(9)。

⑦ 曾维君:略论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利率演变趋势,湖南社会科学,2001(2)。

⑧ 霍存福: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当代法学,2005.19(1)。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⑩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10卷),北京出版社,2002。

⑪ 张雨才: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念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文物,1993(10)。